

特載

中共何去何從：改革與問題

張京育

為期四天的第十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已於本（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在臺北市圓滿閉幕，中美雙方學者一百四十餘人曾在會中就此一中心議題提出二十四篇論文並進行深入的討論。本中心張主任京育的開幕與閉幕致詞，對於中共的所謂「改革」及其所面臨的「問題」，曾作概括而精闢的剖析和結語。茲特併同有關論文三篇一道刊出，藉供讀者參考。——編者

一、開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代表、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今天，第十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在臺北舉行開幕典禮，本人謹代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對與會的全體人員致最誠摯的歡迎。對於遠道來華與會的海外學者、專家以及他們的寶眷，本人特別表示歡迎。

由於中、美雙方贊助機構的熱心支持與合作，一九七〇年以來，在中、美兩國已輪流舉行過十二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由於這許多單位與個人的共同努力，使這一系列的研討會成果豐碩。在美國方面，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喬治華盛頓大學中蘇問題研究所、喬治城大學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南卡羅萊納大學國際研究所、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國際研究所和東亞研究所，分別主辦第二、四、六、八、十屆大會。對於喬治華盛頓大學中蘇問題研究所主辦的第十二屆大會，我們的記憶仍然十分深刻。我們非常感謝胡佛研究所的康培爾博士和史塔爾博士，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梅谷博士、西格爾博士、詹森博士和辛頓博士，喬治城大學的克萊恩博士，南卡羅萊納大學的吳克博士和郝蘭德博士，以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羅斯柏博士、史卡拉賓諾博士、葛瑞格博士和狄弟默博士。

在中華民國方面，我們感謝中央研究院，特別是近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以及國立政治大學的鼎力支持。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前主任吳俊才教授、杭大使立武和蔡大使維屏，他們在過去幾屆大會中的重要貢獻，都值得我們衷心感謝。對過去幾屆大

會的秘書長札奇斯欽教授、連戰博士、魏鏞博士和周煦博士，我們也一併表示感謝。

最後，我們要再度感謝在過去幾屆大會中擔任專題講演的特別來賓：史卡拉賓諾博士、查良鑑博士、強生大使、李部長國鼎、羅斯陶博士、蔡維屏博士、魯希大使，以及羅文泰博士。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中國大陸，由於其多樣性、複雜性和不容易接近，對於外行人和學者專家而言，都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研究主題。美國麻省牛頓城的華蕭女士 (Joan Warshaw)，今年二月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她的中國大陸之行的經驗。她說：「在此時刻，去中國旅行真是奇特無比。在與中國人民的交往中，發現我們同一個在諸如建築物、交通與耕作等許多方面落後我們幾個世紀的人生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這種經驗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紐約時報」，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九日）在「紐約時報」同一天刊出的信函中，賓州伯立恆市的愛爾女士 (Elizabeth M. Eyer)，也贊同她的看法。她說：「我的丈夫和我在那個古老的、原始的、謎一般的、令人着迷的國家——中國——度過了二十個晝夜的歡笑和學習。……最後決定你去那裏、怎麼去和什麼時候去的，乃是中國政府。」

曾經在中國大陸鄉村地區居住過的毛思迪 (Stephen W. Mosher)，證實了她們的看法。他在不久前出版的「破碎的大地」一書中，談到難以瞭解中國大陸的情形時，說：「中國融合了與日本相若的東方文化和與蘇聯一樣專制的政治經濟學。但是，日本文化上的差異却由民主制度和市場經濟加以調和，而在蘇聯的那種看似順暢的專制外表下面，也同希臘、羅馬、基督教和其他的西方文明成份具有不可分解的連帶關係。」（第十八頁）

儘管有這許多的困難和限制，研究中國的學者們也終於能夠瞭解中共，而這一系列的會議貢獻良多。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年大會的主題是「中共何去何從：改革與問題」。在斯大林—毛澤東式社會主義被證明是中國大陸人民的災難之後，中共領導班子被迫調整政策，並發動各種改革措施，藉以克服政治不穩，經濟危機，以及範圍非常廣泛的「三信危機」。在過去幾年內，中共領導班子曾經「解放」了大批受過迫害的資深幹部和知識份子，在農村推行責任制，在工業部門進行改革並把重點從重工業轉移到輕工業和農業，容忍甚至鼓勵個體經濟，試圖實施黨政分離，並且在有限、但却是空前的程度上使中國大陸對外國商業開放。

這些變動的實際本質和範圍究竟如何呢？在經濟方面，年邁的鄧小平是否放棄了馬列主義而變成了亞當·史密斯的門徒？他將來有可能成爲亞當·史密斯的信徒嗎？責任制是否就是農村的私營企業，或是佃農制度，而國家仍舊是超級地主？中國共產黨允許大陸上有不同的意見嗎？鄧小平會取消中國共產黨手中的專制工具嗎？中共政權不再對人的愛好自由感到害怕了嗎？——這個政權對於確實的訊息以及其人民同外界的正常交往都認爲是中共制度存續的威脅。當前中共尋求西方科技、投資和有限度文化交流的政策，是過渡性的、戰術性的？還是持久性的、戰略性的？對雷根總統有關自由、民主和蘇聯的威脅等的評論所作的刪除

，是不是顯示出中共政權的眞正本質和意圖呢？再者，即使說中共領導班子有決心進行眞正的改革、更開放，他們是否能推動黨和國家官僚制度來一併進行呢？資深的共黨幹部不再被當作封建諸侯一般看待了嗎？地方上的行政幹部不再被當作土皇帝了嗎？到處貪污腐化，既得利益，思想上的教條主義，以及對過度激進的政策變化的恐懼，會不會成爲當前領導班子意欲進行的徹底改革的絆腳石呢？對於這些以及其他相關的問題，我們也許會有相當不同的意見和評價。本人希望，經由坦誠的討論，我們能夠澄清其中的某些問題。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們感到特別高興的是，除了原有的美方贊助單位以外，俄亥俄州立大學首次加入了我們的行列，而聖若望大學，在停頓數年後，再度以贊助單位的身份重新加入我們的隊伍。我們盼望在未來與這兩個單位建立起密切的關係。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本人預祝大會成功，同時，對於從國外來華與會的代表們，祝你們在華期間萬事如意。
謝謝。

二、閉幕致詞

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這次會議的主題是：「中共何去何從：改革與問題。」過去四天，針對此項主題，我們舉行了十一次討論會、宣讀了二十四篇論文，分別就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及教育、外交及軍事、以及「中共研究」等方面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本人非常感謝各位作者的辛勤、評論先生的細心、以及各位與會者的踴躍參與。

一九七六年後的中國大陸情勢確實發生了若干變化，尤以農村經濟方面爲然。中共自稱所推行的種種改革，乃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眞理」來建設所謂「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從中共數年來的討論和做法來看，這條道路牽涉到範圍廣泛而且內容複雜的政治、經濟、意識型態和對外關係等問題。因爲中共在經濟管制方面，比前放鬆，希望能夠增加人民工作的積極性，提高經濟效益；在政治上不再強調各種運動，減少了人民所受的壓力；同時又使中國大陸的門戶，較前開放，使得若干政治觀察家、中國大陸問題研究者認爲中共已走向市場社會主義、甚至資本主義的道路。似乎在幾年之間，中國大陸已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但是本人比較同意詹鶴（Chalmers Johnson）教授在第十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中所提論文：「中國政治研究的毛病在那裏？」及羅駢孫（Thomas W. Robinson）教授在第十二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所提論文：「亞細亞政治模式」的觀點。他們認爲中共與蘇聯同爲兩個最大的列寧主義國家，鄧小平等人近年採取的措施，只是想恢復正統的列寧主義，使舊有的

制度在毛澤東鑄成大錯和民衆極端失望之後，繼續運作。我們之所以認爲中共已在走列寧主義道路是基於下列的理由：

第一、長期以來中共所信奉的列寧主義原則如以「職業革命家」組黨、奪權和保權、以工農聯盟爲基礎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以及把共產主義社會，分爲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等，至今並未改變。但在毛澤東統治時期，中共有許多做法背離了列寧主義的原則。例如，列寧曾說過：「在一個文盲的國家內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①。而毛澤東却長期打擊和歧視知識分子。毛澤東認爲書不能讀太多，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面，成爲書呆子^②。這種輕視知識的言論使今日中國大陸仍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再如，列寧主張「批判地繼承」的文化政策，毛澤東長期堅持「徹底決裂」的文化政策。

第二、中共正在效法列寧「新經濟政策」的做法，改革經濟體制。

第三、中共在打擊經濟犯罪及整黨的過程中，多方引用列寧的經典言論作爲依據。同時還多方引用列寧的言論說明建設社會主義文明的重要性。

第四、中共引述列寧的言論論證改善農民生活的重要性。

第五、中共自行編譯一部「列寧全集」，今年開始出版。二十多年前，中共根據俄文版的「列寧全集」編譯出版了三十九卷「列寧全集」。新版的「列寧全集」共六十卷，較之現行的「全集」，總篇幅增加約百分之六十，計二千五百萬字。新增文獻中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十月革命」以後列寧的著作。整版將於一九九〇年出齊。中共認爲重新編譯出版「列寧全集」是「關係黨的政治思想和理論建設工作的一件大事……。列寧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同我們當前的實際關係尤爲密切」^③。

從以上五點可以瞭解到，中共不但設法以列寧主義理論爲現行政策辯護，而且正在大走列寧「新經濟政策」的道路。誠如美國學者札哥里亞(Donald Zagoria)所說，一九七八年以來的中共與一九二〇年代推行「新經濟政策」之下的蘇聯極爲相似。今日中國大陸類似斯大林以前的蘇聯制度，而不是斯大林或斯大林死後的制度^④。鄧柏格(Robert F. Dernberger)的論文亦指出中共高級領導階層「都是列寧主義者，將無法容忍背離以由共產黨所支配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來完成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⑤。因此，本人只想舉出目前中共正在效法列寧的一些做法，論證中共正在大走列寧走過的老路。列寧推行「新經濟政策」的基本前提有二：第一、承認資本主義的長處，進而吸收資本主義的好東西如講求效率的社會化大生產、經營管理、科學技

註① 轉引自高原，「試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華中師院學報》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九頁。

註② 毛澤東，「春節談話紀要」（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一輯（臺北：國際關係研究所複製，一九七四年七月），四五七～四六四頁。

註③ 北平入新華社電（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

註④ Donald S. Zagoria, "China's Quiet Revolution," in *Foreign Affairs*, Vol. 64, No. 4 (Spring, 1984), p. 880.

註⑤ 鄧柏格，「中國大陸的經濟制度：新模式或是舊的變種」，第十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論文，（臺北，一九八四），第五頁。

術等。中共欣賞列寧這種做法，正圖引進外國技術、甚至管理方法，以挽救其經濟危機。

第二個前提是關心與改善農民的生活，以調動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如果我們仔細閱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有關農民問題的文件，不難發現中共幾乎完全採取列寧主張改善農民生活的觀點。中共曾把改善農民的生活及允許農民致富做為施政的要項。如果不這樣做，農民可能會鋌而走險。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第一書記陳雲曾在一九七九年指出：「我們國家是一個九億多人口的大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革命勝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沒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這是一個大問題。我在去年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過，解放三十年了，如果再有一二十年不解決，支部書記會帶隊到城裏要飯。不估計到這種情況，整個經濟搞不好」^⑥。

基於上述兩個前提，列寧採取三個主要的新經濟措施。第一個措施是一九二一年三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關於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的報告，通過了從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決定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糧食稅改變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對農民的餘糧完全收集和禁止農民自己買賣的狀況。實行糧食稅使農民的某些要求得到了滿足。農民們在繳了糧食稅以後，可以把剩餘下的一部分糧食、原料以及農副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自由買賣，以換得工業品和生活必需品，這不僅改善了農民的生活地位，也刺激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第二個措施是允許私人開設企業，進行小工業產品和農副產品的自由貿易。列寧認為，禁止和堵塞農民到市場上用自己的產品去交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那不僅是行不通的，而且等於窒息農民的經濟，扼殺國家工業的發展，破壞農工聯盟。他說：「一個政黨要試行這樣的政策，那就是愚蠢，就是自殺」^⑦。第三個措施即實行租讓制，亦即允許私人開辦小型工商企業，並將國家所有的某些企業、廠礦、資源，按一定條件由外國資本家經營或合資經營^⑧。

這三個措施，中共已加以模仿採行。其中以外資經營的方式引進外資進行得最為積極。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只想利用由世界的資金和技術來武裝自己，並非對自由世界的制度和生活有了好感。為了論證中共敵視資本主義制度的觀點，本人引述大陸學者評論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言論，做為佐證。他們指出：

（一）「租讓並不是同資本主義講和，而是新領域內的戰爭」（列寧語）它是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外國資本家對資本和利潤的貪婪，在蘇維埃俄國工業發展落後資金嚴重短缺的情況下，引進國際資本和技術力量，恢復和發展蘇維埃俄國的大工業，促進蘇維埃俄國的經濟建設速度，目的在於打破資本主義世界的封鎖，以鞏固蘇維埃俄國的地位。租讓制是一種手段，是在

註⑥ 陳雲，「調整國民經濟，堅持按比例發展」（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七四頁。

註⑦ 列寧，「論糧食稅、貿易自由、租讓制」，《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十月第二版），五一九頁。

註⑧ 陳慧筠，「試論蘇俄新經濟政策初期的退却」，《世界歷史》第一期（雙月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七日），一一頁。

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共存期間，蘇維埃俄國在合理的條件下讓出一定的經營權，作為俄國從技術比較先進的國家取得技術幫助的一種手段」^⑨。

(二)「租讓制和租借制（筆者按指將某些國有企業租給國內的資本家，或租給合作社和個體勞動者），顯然不是繼續直接向資本沖擊，也並非開歷史倒車，『為資本主義敞開大門』，而是為糾正過頭的國有化政策所必需的一種退却。因為這種國家資本主義是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活動範圍的資本主義』（列寧語）。當時的蘇維埃政府就對租讓制等進行了必要的控制。諸如只出租經營權，而不出讓所有權；主要是租讓一般民用企業，不准租讓國防要害部門；……可見出讓出租並不等於『出賣』。重要的是，實行租讓和租借，能使國家當時無力開發或興辦的資源、土地、企業等得到利用，使閒置的生產力轉化為直接現實的生產力；能獲得學習先進生產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的機會；還能直接改善部分職工的生活等等。這些都有利於改善小生產，有利於把私人資本引向社會主義，有利於壯大社會主義經濟」^⑩。

以上兩段引文旨在說明共產世界和自由世界無論在思想和制度方面都是勢不兩立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曾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是兩個世界。……我們要採取兩手，一手堅定地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因為這個政策是正確的；一手堅定地抵制資本主義的腐敗東西，包括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方式」^⑪。足見，中共反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並未改變，任何企圖透過援助、貸款、貿易等方式改變中共政權本質的努力將屬徒勞。

從過去兩年來中共公布的資料判斷，所謂「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並未形成。中共只是先瞭解中國大陸的「基本國情」如「底子薄」、「貧窮落後」、「人口多、耕地少」交通不便、幹部和羣衆的文化教育程度低、民主生活不健全、生產技術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很大等^⑫，然後針對本身的需要，根據列寧主義的道路來擬訂所謂「中國式的現代化」藍圖。其實走列寧主義道路是一條可悲的道路，只不過在共黨控制全部權力與政策情形之下獲得少許經濟情況之改善而已。在研判未來時，我們可以說這種有限度的改善將是極為有限的。第一、發展困難因素之一是低度發展本身，而卅五年的中共統治更加阻滯了大陸的進步。第二、資源與人口的比例關係日趨惡化。三十年來大陸人口幾乎加倍，到本世紀末將達十三億人，但耕地不僅未增，反有減少的趨勢。第三、儘管經濟上的略為放寬提升了農村的生產力，但那只是一時的現象。除非在品種、肥料、灌溉、交通等方面有所改良，農

註⑨ 李樹藩，「論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東北師大學報〕（雙月刊）（長春：東北師大學報編輯部，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日），九〇頁。

註⑩ 同註⑨，一三—一四頁。

註⑪ 胡耀邦，「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人民日報〕第一版（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

註⑫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一四九頁；于光遠，「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月），五九—七九頁。

業生產無法有更多的進步。然而，中共不願也不能在農村中進行大規模的投資和技術革新。第四、多年來，政治籠罩了大陸的教育和文化，教育受到摧殘與忽視。知識分子更是膽戰心驚。整個中共體制是由無知的教條主義者所控制。這些教條主義者將繼續成爲任何創新的障礙。第五、中國共產黨威望低落、活力消失。其黨員大多腐敗無能、投機取巧。要想整黨整風來完成艱巨的中國大陸現代化任務，實難如登天。

本人以爲現代化有它的共同特徵如工業化、都市化、世俗化、專業化、自由、平等、普遍參與、重人才而不重關係、高度流動性及沒有文盲等，不具備這些特徵，就不是真正的現代化。綜觀世界最近現代史的發展，共產主義在蘇聯走不通，在東歐走不通，在中國大陸走不通，共產主義已被證明爲一條走不通的死胡同。中共不應幻想走出一條所謂「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來。世界近代史的發展告訴我們：唯有尊重基本人權，實施政治民主，推行自由經濟，實現教育機會均等，發揚言論、出版、宗教自由的道路，才能促進經濟繁榮和人民幸福。我們覺得中共只有放棄走不通的共產主義道路，改走自由民主的道路，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辦法，也才是中國人民對世界和平與世界發展可作的最大貢獻。

最後，本人想就香港問題講幾句話。詹鵬教授的精闢論文提供了良好討論的基礎。香港人不是專業的中國大陸注視者，但他們一直關注中國大陸。許多人都有至少逃離中共極權體制一次的痛苦經驗，然而他們仍然密切注視中國大陸的發展。儘管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現了若干調整而中共提出了不少保證，香港的中國人對中共並無信心，亦不願接受那些保證。他們稱一九九七爲「大限」，紛紛成爲「太空人」（即將妻兒送到較安全地區，隻身留港等待養老金。）資金與人都在逃離。本人認爲香港人的未來，正如西柏林人的未來一樣，應當是一切愛好自由的人民實際上與道德上所關切的對象。如果香港的中國人喪失掉自由、尊嚴和繁榮，而我們坐視不顧，歷史將予我們最嚴厲的裁判。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第十三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即將閉幕了，本人非常高興俄亥俄州立大學將成爲明年的主辦單位，以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學術聲望，我們可以期待一次非常令人鼓舞的學術會議。

最後本人謹祝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身體健康，遠道來華與會的學者及配偶們，旅途愉快。謝謝！